

澄舍文录

陈长荣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澄舍文录

陈长荣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澄舍文录/陈长荣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72-1342-5

I. ①澄…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9077 号

澄舍文录

陈长荣 著

责任编辑 许周鹣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215006)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排 版	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装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8.25 插页 4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72-1342-5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 文史杂论 ·

中国谋士论	003
论围棋文化与中国智慧	024
一、围棋之道	025
二、弈家风韵	036
三、纹枰之用	042
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048
陶渊明的创作个性与诗歌之艺术特色	055
一、魏晋风度与陶渊明的生活情趣	055
二、陶渊明诗歌意境的美学风貌	065
1. 真趣满诗篇	066
2. 意象浑成与境外传神	072
3. 适性抒怀与缘意写景	080
4. 简语写深思	087
三、陶渊明诗歌的美学风格	090
1. 田园咏唱与悲慨怨歌	090
2. 优美与壮美的结合	100
3. “高情逸想”与“自然流出”	110
4. 诗格与品格	123

· 苏州评说 ·

苏州人:人文风貌与文化底蕴	135
一、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	135
1. 水文化的孕育	136
2. 园林气韵的渗透	137
3. 状元风采的流溢	139
二、包孕丰富的文化蕴涵	141
1. 小巧精细的传统	142
2. 柔和淡远的风格	143
3. 雅致秀丽的特质	146
4. 灵动飘逸的神韵	149
三、生生不息的现实流变	151
1. 从吴音异化看文化迁移	151
2. 文化辩证法:苏州人性格的另一面	153
3. 集体无意识:深层文化的探询	157
苏州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蕴涵	162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苏州文化	175
关于苏南文化现代化的思考	188
走出苏州	197
再造苏州	200
再造苏州在造人	
——《人的现代化与苏州》读后	202
文化和合与苏州再造	205
三重奏下的和合苏州	208
苏州有多大	211
苏州发展升级 经营理念转型	214
一、树立“文化立市”理念 促进苏州发展转型	214

二、大力发扬精致精神 变换苏州经营方式	217
三、努力打造精致产业 助推苏州城市升级	219
文化苏州:在圆融会通中综合创新	222

· 出版漫谈 ·

走向精致出版	231
一、精致,作为一种出版理念	231
二、精致,作为一种出版策略	234
三、精致,作为出版人的一种职业素质	237
全面推进出版文化建设	240
地方高校出版社的定位与选题战略	243
服务地方建设 增强办社特色	
——关于地方高校出版社发展战略的思考	249
一、准确定位,树立为地方建设服务的自觉意识	249
二、精心设计,开发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出版选题	250
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地方综合优势	252
读解扬州	
——“扬州文化丛书”编辑手记	255
竹西佳处话扬州	
——“扬州文化丛书”编后记	257
深度开发地方文化出版资源	
——“扬州文化丛书”出版手记	259
一、出版“扬州文化丛书”之缘起	259
二、“扬州文化丛书”的出版过程	260
三、“扬州文化丛书”的几个特点	261
读解苏州	
——“苏州文化丛书”编辑手记	264

全球化数字化下的中国基础教育

——读《基础教育再把脉》 267

我们如何面对知识经济

——读《知识经济概要》 270

吴经国的五环人生

——读《奥林匹克中华情》 275

《做人与做事》编辑感言 277

编辑看书展 感悟自不同 280

地名的文化意蕴

——“地名文化丛书”总序 282

无怨亦无悔 编辑三十年

——后记 285

文史杂论



中国谋士论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一群人物伴随着君主活跃于社会的舞台上,这就是本文所要论及的谋士。中国谋士属于一个特殊的文化阶层。虽然在数量上他们的人数甚微,但其身上释放出来的能量不可低估,从后世对诸葛亮、刘基等谋士人物的津津乐道来看,亦可以见出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从文化心态上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她对于实际事功中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是无比倾慕的。中国古代经典《周易·系辞》中有“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的说法,就是看重在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社会环境中把握规律的能力和智慧。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固然是说人多主意多,但亦可从中看出中国人是把诸葛亮当作智慧之化身,他们对谋士一类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智”是持赞赏态度的。本文拟对谋士人物在封建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他们与君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做初步的探讨,以期增进对于这一特殊人物阶层的了解和把握。

一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谋士就是智囊之士,是指那些足智多谋的人。《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汉书·晁错传》亦有“太子家号曰:‘智囊’”的记述,颜师古注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由于这类人物常在君主左右为之出谋划策,故亦被称为军师、策士等,他们的角色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参谋”。中国古代也是有“参谋”这一头衔的。例如《三国

志·程郭董刘蒋刘传》记载：刘放为秘书监，“辽东平定，以参谋之功”，得到了封赏。这里的“参谋”即参与中枢谋划之意。《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天下兵马元帅”下设“行军参谋”，也是指参与军中机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参谋一类的谋划人物已采用了一定的组织手段，不过，这种机构还不如现代参谋机构那样有一套完整严密的制度，因为这套机制是直到 19 世纪才得以在西方首先形成的。而今，国外的所谓“思想库”、“智囊团”、“外脑”则在制度和功能上均更趋完善了。中国古代的谋士就扮演着智囊的角色，只是比起那些带着“参谋”等头衔的中国古代官员来，他们的地位要高一些，作用要大一些；比起时下国外的“智囊团”来，他们与君主之间的关系要更密切一些，在决策中的影响也要更大一些。从实质上看，谋士人物是环绕在君主身边搞战略性谋划的人才，是随时以供咨询的高级顾问，也是君主处理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得力助手。谋士人物靠出售自身的智慧以求得君主和社会的接受与承认，而在为君主出谋划策的过程之中，他们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和完成了在社会中的角色功能。

纵观历史，常见有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动荡不安和政治、军事等斗争异常紧张而激烈的时刻，往往会涌现出一批批杰出的谋略人物，他们犹如团簇的群星辉映照耀在广袤的夜空。在战国争雄、楚汉逐鹿、三国鼎立、元末纷争那样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年代里，有多少谋士人物活跃于风口浪尖上，或驰才逞辩于唇枪舌剑的外交战场，或刻骨镂心地运机谋于帷幄之中，无不竭尽腹中之谋，献出全身之智。时代需要这样的谋略家，也造就了这些精研覃思的谋略之士。试看战国时代：七国争雄，中原逐鹿，于是，一面是战场上征尘滚滚，刀光剑影，一面是帷幕中不动声色，审时度势；一面是战场上的“斗力”，一面是幕后的“斗智”。在风云际会之时，谋士们的用武之地是无比广阔的。君主们大搞结盟、“伐交”，一时盛行“连横”、“合纵”之举，谋划之士巧运机心、纵横捭阖，竭尽角逐之能事，一部《战国策》充分表现出了这批策士人物“度时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①的情形。可以说，战国

① 《战国策》刘向序。

时代是一个崇尚智力超过崇尚武力的时代,只要看一下那些朝为布衣、暮为卿相的纵横智谋之士的发迹图,就不难了解到君主是越来越看重谋士的功能了。其实,早在春秋时的齐国管仲就已经指出:“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刑争权。”^①他又说:“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境,计未定而兵出于境,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②管仲强调“先定谋虑”、“利权称”、“计必先定”,他看到了斗智在诸侯争霸中的巨大作用,这是对战国斗智时代即将到来的伟大预言。战国时的韩非在其著作中记载了赵简子的话:“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矣。”^③烛过何许人也?只不过是赵简子身边的一位谋士,可在赵简子看来,他的计谋竟胜过千军万马的功用。自然,这种形容有夸张的成分,但谋臣的非同寻常的功用自可由此窥见一斑。战国时期“士”阶层(谋士是这个阶层中的重要成员)的崛起,正顺应了时代之趋势。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一代之治有一代之才。先秦之后的每一时代也都有顺应其需求的人为之服务。总的说来,谋士阶层均是以其“智”参与到大系统中去,并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里发挥其独特之作用。

在开国君主那里,总战略是与其事业成败攸关的生命线。制定好总战略,是君主面临之关键问题,也正是谋士们得以驰骋运思、施展才智的广阔战场。他们在《孙子兵法》称之为“庙算”的问题上无不全力以赴,以其精湛的深思来把握时代的脉搏,开出疗治的良方妙药。在这种极为复杂而艰苦的智力运思中,他们犹如解牛之庖丁,从容往来而游刃有余,显示出雄才大略。每每于君主疑难之际,谋士们总能熟筹深运而适时提出宏谋远略以排忧解难。三国时诸葛亮隆中决策就是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在刘备兵少将寡而几陷穷途末路的时候,诸葛亮提出了鼎立之策,从而有似茫茫大海上导航的灯塔,为刘备指明了摆脱困境

① 《管子·霸言》。

② 《管子·参患》。

③ 《韩非子·难二》。

的出路,使其感到“顿开茅塞”。《隆中对》中的方略真可谓字字良言、句句金石。诸葛亮首先分析天下大势:曹操“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接着,他又为刘备分析了“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等自身的情形。正确的现实形势分析是制定正确对策的基础和前提,他从而向刘备提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以北向抗曹的重要对策。刘备采纳了这一对策,由漂泊四方、寄人篱下的刘皇叔一变而成为称霸一方的蜀国君王。如果没有军师的隆中对策和以后的多次献计,刘备要在群雄混战中鼎立一方是难以想象的。

凡是带有战略性的基本方针,谋士们均能积极地提出高见和长策,而君主对此亦会极为重视,往往与谋臣切磋再三,以期使主观指导方面尽可能符合于客观实际,充分把握事态发展的内在规律,顺利地达到预期之目的。宋朝开国君主赵匡胤寒夜踏雪访赵普,围在炉边有一场夜话,其话题就是商讨用兵北汉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决策。起初,赵匡胤曾设想以北汉(太原)为首要打击目标。他曾和一些人商量过,没有得到赞同的意见。他想进一步征询赵普的看法。赵普认为,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就是说,先打太原,有害而不利;不如等待削平南方诸国,则“彼(太原)弹丸黑子之地”将无处可逃。这就是著名的“先南后北”的战略决策。赵普的精当分析使赵匡胤胸中的疑云顿消,两人就这样共同拟定了后来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决策。谋臣赵普的“襄赞定策”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这里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谋士群的战略建议对朱元璋夺取天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于此仅举其三次牟牟大者:第一次,谋臣冯国用等人向朱元璋面陈夺取天下之计,认为:“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他们指点朱元璋将金陵建为根据地,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一着高棋。后来朱元璋西讨东伐,得力于有了这块比较牢固的根据地。第二次,谋士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对策,言简意赅,意义深远。当时正值面临重

大转机之时，朱升及时向朱元璋敲响了警钟，希望他有长远之图，不要患上近视症，这一宏图大略引起朱元璋深深的共鸣。第三次，刘基为朱元璋提出了“先陈后张”的重大对策。其时，朱元璋的地盘仍然仅有“江东数郡而已”，“陈友谅据上游，张士诚吾腹心之患，一有警报，首先牵制，吾居中应之，实为艰难”^①。两面作战为实力所不允许，且从斗争策略上讲亦很不高明。那么，是先西向进行解决陈友谅的战斗，还是先东向消灭张士诚呢？这不是随便可以落子的一步棋。刘基精辟地分析道：“（张）士诚自守虏，不足虑。（陈）友谅……地居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②刘基分析陈、张的战略态势，认定：如先伐张，则陈将袭其后，我将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若先攻陈，张士诚目光短浅，会苟安而不出兵救援。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刘基的分析是有根据的。他的“先陈后张，先西后东”的作战方针得到朱元璋的首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起见，我们还可以为谋士人物在平定天下中的作用提供一些反证。纵观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战争，固然由于得不到先进政党的领导等因素，因而没有能取得成功，但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失误亦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战略问题上的失误，与在农民起义军队伍中缺乏有远见卓识的智囊团或者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些谋划人物的智慧有着较大的关系。政策和策略是生命之线。同样，正确的战略指导亦是农民起义军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有没有这样一个谋略家阶层，这个谋略家阶层的战略水平有多高，以及能否采用其提出的正确主张，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同样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刘邦开始较弱小后来反而成功了，项羽起初颇强大尔后反而失败了，这与刘、项各自能否任用人才，包括能否重用谋略人才有着重大的关系。项羽手下的范增是个足智多谋的谋划人才，他多次向项羽提出比较好的战略性建议，但大多未能被采纳。后来，项羽中了刘邦一方的反间计，他怀疑起自己的谋臣来，范增被迫离开了君主。项羽之举

① 《太祖实录》卷二十。

② 《明史·刘基传》。

无异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砍掉了自己一得力之臂。相反，刘邦则深知谋臣作用之奥妙。在得天下之后的一次宴会上，他与列侯诸将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我刘邦为什么能得天下，而项羽又为何失去天下？有人答了一通“项羽妒贤嫉人”而陛下与之相反之类的话。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①刘邦这番话可谓说得一针见血。谋臣进退与事业成败之关系，通过这位君主之口是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再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例子。李自成能够顺利地攻取北京城，与他有一套比较正确的战略方案有密切的关系。在李自成转战鄂豫川而计划今后的作战方向时，谋士们内部曾有不同的意见。牛金星认为应“先取河北，直走京师”；杨永裕则认为应“下金陵，断燕都粮道”；另一位谋士顾君恩分析道：“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他认为前二策一失之太缓，一失之太急，经过权衡比较，他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②这个方案考虑了轻重缓急，进退有序而攻守有节，应该说是周到严密而切实可行的。李自成采纳此说，从而一环扣一环地顺利实现了攻占明王朝京都的战略目标。然而，在此以后，李自成周围的伙伴耽于安乐，头脑昏昏然起来，就连那些理应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谋士人物也没有保持住应有的清醒意识，跟着别人一起陶醉在天下太平曲之中。谋士们没有看到：在明王朝灭亡之后，虽然他们与明王朝的矛盾算暂告一段落，但随之而来与清军的矛盾急剧地上升了。他们没有及时地提出适应新形势的战略方针，在虚假的歌舞升平中迷失战略指导方向，终于为清军所乘。这时的谋士中只有李岩尚比较清醒，他看到了潜在的危机

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② 《明史·李自成传》。

并提出一些对策,可惜其时的李自成已听不进这些意见。与之相反,当时清人皇太极正虎视眈眈地窥视着关内的态势,他迫不及待地召见了时正养病的谋臣范文程,范文程纵论天下大势,明白无误地指出:我方虽与明王朝争夺天下,但实际上现在已转移为与李自成的较量了。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诸如拉拢明朝官吏、进军关内等一系列对策。相比之下,李自成的战略就显得相形见绌,其失败的命运就是自然而然的发展了。在战场上烽火连天之前,双方谋士互相斗智较量的战略天平已经发生了倾斜。《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信哉斯言!

谋士们不仅在纷纭的战争风云里运筹帷幄,为君主的建国定邦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在治理天下、为王朝谋求长治久安方面亦贡献了其杰出的才智。他们往往以其慧眼精到地剖析天下大势,向君主进献各种远谋长策。汉初谋臣陆贾和刘邦曾有一段对话,陆问刘何以得天下,刘颇有点自得地说:“乃主马上得之?”陆贾反问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这话把刘邦给问住了。陆贾实际上提出了在新王朝建立以后如何实行重大战略调整以适应所面临任务的问题,而在这一点上刘邦当时还有点茫然,他的思想步履还没有迈出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对历史转折新时期局面的来临有点准备不足。陆贾这位谋士悠长的思虑有助于刘邦正视新的历史现实。再如,汉文帝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谋臣贾谊是一位在皇帝身边时备咨询的博士,后被提拔为议论政事的太中大夫,为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了不少著名的建议。在《论积贮疏》中,他指出其时社会上重商轻农的“背本趋末”现象,并积极提出预防性的对策。在《治安策》中,他痛陈天下的积弊,指出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是不懂得治乱大体的人,警告汉王朝统治者:“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贾谊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绝非杞人忧天,而是基于对时势的深刻洞察。这位谋臣对历史上的治乱十分熟悉,献计献策,忧国忧民,痛哭流涕,热诚难得。他十分敏锐地看出西汉王朝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巧妙对策。这种居安思危的清醒意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毛泽东称赞说:“《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

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①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贾谊是非常富于洞察力的，他的建议虽在生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他死后才四年汉文帝就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这实际上就是采用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对策。贾谊这种透过表面繁华现象而见出问题所在的忧患意识正是历代杰出治国谋臣的共同特点。与此遥遥相对的类似情形是谋臣赵普的对策。宋太祖在建国以后曾向谋臣赵普提出过两个问题：为什么自唐末以来争战之事无休无止？有什么办法可以从此息天下之兵而国家得以长治久安？赵普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方镇之权太重而君弱臣强，根治的办法在于削夺方镇之权，制其钱谷而收其精兵，如果能做到这些，天下自然就会安定。还没等赵普说完，宋太祖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果断地采用了“强干弱枝之术”，这与所谓的“杯酒释兵权”之法一起，对于加强和巩固皇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

谋士角色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被赋予了重要的功能，其特殊的角色扮演是以抛售自身智谋功能而得以完成的。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是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的阶层，而必须依附于“人主”即他们所事奉的人物阶层才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固然，就每个具体的人来说，有些谋士比较注意自身的所谓“独立人格”，例如，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躬耕于南阳田亩做卧龙先生，前秦王猛在遇苻坚之前隐居于华阴山，元代耶律楚材未遇时在家中打坐参禅度日，他们不肯轻用其锋，在得到能赏识其才干的知音之前是不肯轻易抛出自己的，也就是如孔子所说的“隐居以求其志”。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怀荆负璞的谋士大多是有志于大济苍生的宏图之士，历史的风云赋予他们以深沉的使命感，其暂时的隐居不仕实出于无奈，表面之退正是待时以进。孔子云：“沽之乎？沽之乎？”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39 页。